

苏联大使館内幕

(一个俄国外交官在緬甸的經歷)

亚历山大·卡茲納切耶夫著

(供內部参考)



苏联大使館内幕

(一个俄国外交官在緬甸的經歷)

亚历山大·卡茲納切耶夫著

沈苏儒、梁于华、吳继淦、

馬竞生、陈厚珩譯

(供內部参考)

Aleksandr Kaznacheev
INSIDE A SOVIET EMBASSY

Experiences of a Russian
Diplomat in Burm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New York, 1962

根据美国纽约利平科特公司 1962 年英文版译出

· 供 內 部 参 考 ·

苏联大使馆内幕

(一个俄国外交官在緬甸的经历)

[苏] 亚历山大·卡兹纳切耶夫著

沈苏儒、梁于华、吴继淦、馬克生、陈厚珩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編印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63 年 6 月第一版 1963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7 1/8 · 字数 158,000

統一书号 3003 · 679 定价 0.90 元

目 录

序言	西蒙·沃林	2
第一章	只給經過特別挑选的人	7
第二章	“一个苏联好公民”	12
第三章	一个苏联外交官的形成	21
第四章	暗綫	29
第五章	坚挺的货币	43
第六章	囚犯似的外交官	56
第七章	人員和工作	69
第八章	冷战机构	84
第九章	我恨人人，人人恨我	94
第十章	共产主义兄弟	102
第十一章	君子协定	120
第十二章	我发现了緬甸	131
第十三章	帮助緬甸人	143
第十四章	心理战	153
第十五章	在緬甸的苏联情报单位	159
第十六章	政治情报工作——一种无比的武器	166
第十七章	我們在仰光的人	179
第十八章	单行道	194
第十九章	偷来的幸福	210
第二十章	决定	216

作者說明

本书所述经历都是如实紀載，只是为了明显的理由，某些次要情节改編了一下，某些人名和对个人的描写作了更改。

序 言

肯尼迪總統在去年 11 月接見莫斯科《消息報》主編時，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談話。他說，蘇聯企圖使全世界共產主義化是造成國際緊張局勢和核毀滅危險的原因；他接着說，如果蘇聯放棄它把共產主義制度向一國又一國推行的努力，冷戰的緊張局勢就會消逝。莫斯科對這個指責的回答是憤怒和否認，還熱烈呼呼和平共處和裁減核軍備，仿佛尼基塔·赫魯曉夫就要去參加伯特蘭·羅素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舉行的靜坐示威。在西方，總統的談話贏得了普遍的贊同。

丘吉爾曾經說，蘇聯是“謎中之謎”。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蘇聯的目的、成就和失敗都已經達到令人觸目驚心的規模，不論是鐵幕或是柏林的牆，都再也隱藏不住了。但是，蘇聯在它的集團範圍以外所進行的日益擴大的運動，提出了值得密切注意的新問題：“共產主義化”運動的危險性有多大？它的戰略和戰術是怎樣的？必須採取什麼措施才能挫敗它？歷史並沒有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因為集權國家的新帝國主義發展了新的、狡猾而有效的方法。

這本書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它是作者（他在 1959 年投奔了西方）根據自己在一個不發達國家的經歷寫成的。這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已很有影響，現在是莫斯科注意的主要國家之一。在政治家們中，列寧大概是第一個預見到老帝國主義即將衰敗，預見到同那些為自己初具雛型的國家感到榮耀非凡、敵視以前的西方統治者的新獨立國家建立聯盟的好處。列

宁的“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同最落后的国家建立联盟，是公然違反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滿不在乎。早在1920年，当苏俄刚刚从内战中摆脱出来，还处在經濟瓦解的苦难中的时候，他就在巴庫召开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騙人的大会，代表都是冒充的，但是它为一种在几十年后开花結果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不管怎么样，苏联在不发达国家使用的征服手段，不过是苏联对外政策总战略的一种經過簡化而更加精悍的形式。它的基本組成部分是隶属于“国家保安警察部”的所謂“政治情报組織”。这本书提供了充分的材料，說明这个无孔不入又有高度技巧的情报組織怎样进行滲入、腐蝕和破坏当地政治力量的秘密活动，它怎样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以至在某些方面凌駕于官方的大使館之上。

情报机构不是苏联发明的，也不是它专有的。沒有一个組織完善的情报机构，任何大国都难以存在。冷战时代，尤其如此。但是情报机构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担负的任务，同它在西方国家政策中担负的任务，实质上是不同的。搜集軍事、經濟、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秘密情报，不过是苏联情报机构附带的工作，它的主要目标是顛复現存政治制度。这个目标也許是短期的，也許是长期的，視当地情况而定。但这是所有各地苏联对外政策的真正的、最高的目的。这就是肯尼迪总統所說的“共产主义化”，也就是尼基塔·赫魯曉夫在紐約对美国听众讲的“我們将要埋葬你們”这句话的含意。

这本书通过緬甸的实例，生动地說明这套办法是怎样执行的。当大使館在进行日常外交活动、同緬甸政府談判协定和条約的时候，藏在大使館三楼的一个特务机构正在把共产党和其他反对集团組織起来，为武装叛乱者提供軍火和金錢，而且同莫

斯科的保安警察总部保持着直接联系——一句话，它正在阴谋恢复大使馆所在地的政府。进行这些恢复活动的主要工具是当地的共产党和各种共产主义外围组织（在这些组织里，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者同腐化分子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大使馆、前来访问的苏联权贵和苏联控制的报刊，却在宣扬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和各国友好。朝鲜有一句成语说得好：小心笑里藏刀。

作者对国际关系学院和“苏联大使馆内幕”的观察，也流露出属于苏联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员的心理。这同最近访问过苏联的有见识的外国人的报道是相符的。革命以后最初一个时期曾经使许多新吸收的年轻党员充满活力的革命精神，以及虽然浅薄、然而出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已经消失。现在的年轻党员（虽然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对革命已经不感兴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厌烦，对一切思想体系表示轻蔑。他们完全受实用主义的支配，而这种实用主义常常流于犬儒主义。但是，这本书说明，同这一代年轻人密切接触就能发现，他们这种由极权制度造成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在心灵深处，这些青年男女仍然是俄罗斯人。这就是说，他们仍然是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而不是苏联几十年历史的精神上的产物。一当遇到幸运的机会，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分子就会拉下共产主义说教的眼罩。

命运赐给了亚历山大·卡兹纳切耶夫这样的机会。他对缅甸的生活方式起初感到惊奇，后来就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用他习以为常的苏维埃标准来衡量，显得多么不同。从这些质朴的人们身上，他第一次看到，个人自由、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使生活更丰富、更愉快的具有极大价值的东西。尽管他是在反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他发现佛教产生了他本国同胞所不知道的道德标准。对一个苏联人来说，这些

简单的真理都是惊人的发现。

促使一个年轻人抛棄祖国、家庭和有希望的前途，而投向难以預料的黑暗朦朧的未来，是需要十分强烈的心理震动和极大的勇气的。

西蒙·沃林

1962年1月于紐約



第一章

只給經過特別挑選的人

1957年3月，我接到通知，外交部派我去緬甸的一切事情都已經就緒。這件具有戲劇性的大事的准备工作使我的神經緊張了將近三個月，現在算是結束了。我自己的歷史、我的親戚和祖宗兩代歷史上的每一件事都經過徹底審查。我填寫了幾百份文件和特殊表格，然後來到兩個不同的機關。

蘇聯外交部新建的獨幢大廈是在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廣場。我跑到大廈的十六層樓上，站在主管整個東南亞科人事工作的負責人辦公桌面前。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寫什麼。我一聲不響地站着，无可奈何地等待他請我坐下。最後，他說話了，頭還是埋在那堆文件裡面：“你很幸運，卡茲納切耶夫同志，非常幸運。”他說得很慢，彷彿很勉强的樣子。“老實說，我原來以為你是不會入選的。當然，你的歷史很清楚，社會關係沒有問題。你的學習成績也很好。可是，你在共青團里不大積極，你在这方面得到的評語是不怎么樣的。現在成長起來的青年可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哪！”他抬起頭來望着我，裝出失望和憤怒的樣子。“五年以前，誰要是像你這樣的共青團鑑定，任何人都休想做出國的夢！”他接着用比較和藹的聲調說，“你是個聰明的有心人，卡茲納切耶夫，你倒居然在別人還沒有想到之前就學會了緬甸語！我們需要懂緬甸語的人。”“好吧”——他淡淡一笑——“恭喜你。只有從我們最優秀的年輕人里挑選出來的最優秀的人，也可以說是精華里的精華，我們才派到國外去。”

我竭力做出严肃的样子，因为我知道在这段开场白之后，接着将是老一套的训话（我已经听了五、六遍），大意是：“派你到争取共产主义最后胜利的斗争前线去，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很大信任。你将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 and 政治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等等。

真叫我奇怪，人事的主管人显然决定不再来那老一套了，因为他从椅子上吃力地抬起大腹便便的身体，向我伸出了肥胖的手，手里是一本绿色软皮面手册——苏联外交护照。

“还有，驻仰光的大使馆是我们在东南亚最好的大使馆之一——一个很好的、紧密的集体，都是一些能干而忠诚的同志，集体精神好，相互友爱。也没有人抱怨在缅甸工作条件艰苦。我相信，你加入这个美好的家庭，和他们一起工作，将会使你受到鼓舞。好吧，祝你幸运，再见吧，在工作中一切顺利！”

动身前的三天里，我疲于奔命。我的所有苏联文件，国内护照、共青团团证、兵役证、工会证等等都要交给有关组织保存。无数亲戚朋友要拜访或者接待。许多人在道别的时候看着我，仿佛我是去作一次最危险的旅行似的，用俄国人惯有的感情冲动的样子哭泣着。尽管如此，所有的人都向我投来明显的妒羡的眼光，提出了成百个要求，要我给他们从国外带纪念品和礼物。

然后是最后的审问。这次是在另一个机关（感谢上帝，是最后一个了）。这个机关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幢状如洞穴的灰色大楼里面，警卫这所大楼的是强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士兵（苏联秘密警察）。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聚集着大约二十五到三十人，有男有女，都是第一次奉调出国的。门开了，一个大个子以果断的动作走了进来。他有着一副威严的表情，有点像一个党委书记，又有点像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同志们，我们将

同你們討論一下有关你們在被派去的国家里的行为的一些十分严重的問題。請隨我到大厅里去，我在那里將發給你們‘国外苏联公民行为守則’。你們必須仔細閱讀和記住，然后在那頁空白的紙上写下誓言，表示恪守这些規則，并且完全了解違反这些守則將要受到的懲罰。”一个秘书拿来一堆小冊子，上面标着“仅供內部使用”和“密件”。

苏联公民在国外被禁止做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例如不得通过普通邮电机构寄信、单独旅行时不得同外国人交談、不得进“可疑的娱乐”場所。規定的还不仅是禁止事項，我們还奉命在發現我們的同事、邻居和朋友有任何形迹可疑之处的时候，就要报告；在自己家庭里要搞好关系，发生任何摩擦就向各自的領導汇报，等等。最后，小冊子讀完了，我們在紙上簽了字。

“好，同志們！”剛才說話的那个儼如要人的官員接着說，“我再一次提醒你們，你們將生活在含有敌意的环境之中，也可以說，是在我們的敌人当中。你們中間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各式各样的反共分子和資產階級雇佣報紙挑衅的对象。你們的每一个錯誤都将被利用来破坏我們光榮的苏联的威信。应当步步留心，时时檢点，因为国外的人民将根据你們的情况對我們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作出判斷。注意戒备，时时警惕。”

我們乘的荷兰国际航空公司客机在晨曦中飞近緬甸海岸。机下的孟加拉灣一片澄藍。我心里充滿了对外交部一位好心的恩人的感激，他为我安排了取道欧洲的旅程。就在昨天，我曾經漫步羅馬街頭，妄想在一天之中抓住所有的东西——古代遺址、梵蒂岡、博物館、人們、商店；当时，我脑子里还留着在維也納逗留和在宏偉壯麗的阿尔卑斯山旅行的記憶。在过慣單調的苏联

生活之后，西欧的一切欢乐和使人难以相信的物质上的繁荣，使我几乎眼花撩乱了。直到这时，我才完全定心地感觉到，我已經出国了——到了苏联的境外，这是絕大多數苏联公民的最大梦想。

我在仰光的明加拉东机場走下飞机，一陣又热又湿的气流向我臉上扑来——就像一間暖房的門突然打开了似的。我几乎像奔跑似地一陣快步，走到机場上一座新得出奇、又有空气調节設備的大厦的蔭凉处。然后站进长长的旅客行列，让毫无表情的緬甸海关人員檢查行李、护照和防疫证明书。

大厅尽头出現了一个穿白衬衫、卷起袖子的金发男人。他眼睛里充滿自信的神色，經過旅客的行列，細看每个人的臉。接着他就毅然决然地笔直向我走来，可能他已經准确无誤地从这一群人中間认出我这苏联人来了。

“你好，是卡茲納切耶夫嗎？我是这里的副領事。怎么这样晚才到？我們以为你昨天会到的。”于是他显出一副上級的神气接着說，“你运气不錯。我們在这里給一等秘书送行，可以帶你去大使館，要不然，你就得自己去了。把你的护照給我。”我把所有的证件都交给了他。他头也不回就毫不客气地冲向正对着海关人員的柜台。他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在这里感到毫不拘束。

我不由自主地想，看起来緬甸似乎真的可以說已經变成“人民民主国家”了，就像近几年来苏联报纸和广播描繪的那样。排队的旅客們虽然對我們射来不滿的眼光，但沒有作声。我那位有經驗的同胞說着半通不通的英語，要求那个海关人員馬上查驗我的证件。过去大概也是采用这种同样办法的，因为海关人員认出是他，就帶着不高兴的神气，很快地拿起我的证件，办完了手續。

我們走出大廈，上了大使館的汽車。這是一輛“嘎士”——俄國式的“陸上游歷者”，即吉普車。車上有兩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在不耐煩地等着我們。他們帶着微微的好奇心，對我從頭到腳地打量了一遍；最後，他們的眼光停在我的手提箱上。“你給我們帶什麼東西來了嗎——信、包裹？”

我顯然不知所措地回答說沒有。他們臉上那種好奇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對我絲毫不感到興趣了。大家在路上都沒說話。因為車子常常顛簸得很厲害，我們就在座位上一跳一落。我那些同伴們憂郁地望着緩慢地在我們前面展現的並不令人感到高興的景色。

低矮的灰色灌木、疏落的棕櫚樹和樹頂又平又齊的樹，在萬里無云的熾熱的晴空下，一动不动地立着。道路兩旁是又壞又髒的茅屋，破敗的竹籬和棕櫚樹葉的屋頂；大軋轆的牛車；光着身子在玩耍的孩子；男男女女都穿裙子，許多人還撐着很大的黑傘。接着是多少帶點西式的住宅房子，四周是濃蔭滿地的大樹，許多住宅周圍種滿了花，有紫紅色的、紫羅蘭色的、黃色的。我正在納罕到城裏不知還有多少路，卻不知道我們已經進了城了。

最後，我們開到一處黃牆圍繞的大宅院，前面是兩扇大鐵門，牆頭上嵌滿了碎玻璃。牆上的銅牌上用緬文寫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館”。我們的司機按按喇叭做了個訊號，一個瘦弱的中年婦女，穿着蘇聯特點很明顯的服裝，從大門旁邊的小棚子里走了出來。她費了老大的勁才打開沉重的大門。啊，一種熟悉的色調已經出現了。我們開進院子。兩幢兩層樓房子，樹木，敗落的花壇和灌木叢，枯黃的草地。在院落一角，柱子上橫七豎八地拉着些繩子，繩上晾着衣服。我真覺得奇怪，即使在這裏，人們也能這樣完美地重新創造出蘇維埃生活中那種親切的、烏七八糟的雜亂。我总算又到家了。

第二章

“一个苏联好公民”

人事主管人說得对：我是幸运的，非常幸运，因为我已經属于被选拔到外交部和国外工作的“少数拔尖人員”。虽然我曾經为此奋斗，但当事情果然这样发展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惊奇——像我这种相当平凡的出身，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給我这样大的荣誉。可是我对出国是高兴的。哪一个苏联公民会不因此而高兴呢！

1932年4月25日，我出生在莫斯科。我最初的记忆，我的“家”就是我和母亲同住的一个房角，母亲当时是一个医科学生。在一所老式木头房子的两間屋里，住着十个人。地方不够，所以父亲不能和我們住在一起。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已經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但还是不得不和他的一个弟弟挤在城市另一角的一个极小的房間里。

我只有周末才能看到父亲。到了周末，他弟弟下乡去了，才空出一个床給母亲和我睡。这种缺乏单独臥室的状态，若在其他国家可能会使任何男孩子都感到烦恼，在苏联却不会。我把这看作一桩天經地义的事情。我甚至于还觉得挺快活，因为对我的許多小游伴來說，“家”只不过是一間歪歪倒倒、簡陋的破房子。

自然，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全国各地雷厉風行的农业集体化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我年紀太小，不可能知道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那些事件产生的后果，在以后許多年內却沉

重地影响着成年人和孩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已經上学。德軍由于开始进攻时取得胜利，已經逼近莫斯科郊区。父亲和他的研究工作组被派往哈薩克斯坦。母亲和我撤退到烏拉尔山地附近一个荒凉的小城烏法。

我們在那里嚐到了忍饥挨餓、奄奄一息的痛苦。母亲想繼續她的医科的学业，但染上了严重的肺結核。我們沒有錢，沒有人帮助，也沒有朋友，因此我在九岁那年就突然变成一个在馬路上撿破烂換口飯吃的野孩子。有几个月，我們几乎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为活命而掙扎着。只是由于一个奇迹，我們最后才算在火車上弄到一个座位，回到了莫斯科。那是1942年，德国人对首都的威胁已經解除。我們在莫斯科有几个亲戚，我母亲进了医院，然而我們两个还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地为活命而奋斗。这种境况甚至到1943年父亲回莫斯科以后，也沒有多大改变，而是一直繼續到战争結束。

从清早到深夜，我必須排很长的队，想办法弄到配給的面包或者几个馬鈴薯。每星期一次，我和邻居們一起，背着背包，爬上火車，下車以后又步行十二哩半，到一个村子里去，用我們的几件衣服換点面粉和牛油。

那是一段艰苦的时期。它教我懂得，生活是一場殘酷的、几乎是野蛮的斗争，在这場斗争中，只有最强壮、最精明的人才能活下去。我接受了这个真理，虽然它同我在学校里学到或从书本上讀到的东西有很大的矛盾。但战争还教给了我一些別的事情：要热爱我的祖国，要感到自己是俄罗斯老百姓的一分子。在每天买食物的长队里，在街道上，在拥挤不堪的火車中，我碰到成千上万各种不同的人，听到他們的談話。我从他們那里知道，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其实并不像学校里教給我的那样，是“人民所爱戴和深深尊敬的領導者”，而是一些騙子手和压迫者，他們杀